

收稿日期:2021-06-28

赵翼《陔余丛考》史书编纂思想研究 ——兼与《廿二史札记》比较

闫志强,姜修宪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赵翼《陔余丛考》中的史书编纂考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于对史书繁简、体例、编次、校正史书、补充史籍等内容的探究。通过比较,可显见《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在对文风的重视、补史的意识、求真的史学观上具有相似性,而在论述水准、考论的内容与重心两个方面具有差异性。此项考察将进一步丰富赵翼史学的内涵,也为探究赵翼个人史学路径转变提供个案支撑。

关键词:《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史书编纂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5-0055-09

作者简介:闫志强(1996—),男,河南新乡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学术与文献研究;姜修宪(1978—),男,山东滕州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xb.1003-6873.2021.05.066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有《瓯北集》《瓯北诗话》《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赵翼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价值等,近年来学界关于《廿二史札记》的研究较为充分,而《陔余丛考》却付之阙如^①,《陔余丛考》为赵翼循陔归乡时所作的学术笔记,其中涉及史书编纂、风俗考论等内容,史学家杜维运曾称赞云:“这部著作,使他从诗人而跻身学人之列。与他齐名的乾嘉大诗人袁枚、蒋士铨,这时已被他远远抛落在后面了。”^[1]赵翼《陔余丛考》中有数量较多的史书编纂考论,目前学界对此部分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空间,从另一方面讲,《廿二史札记》对历代的史书进行探究,数量和价值都值得引起关注,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具有较大的学术性意义。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① 学界对《陔余丛考》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通论性介绍和部分内容辨正为主。其中有雷大受《赵翼及其史学著作》(《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杜维运《赵翼传》(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高振铎、王孙贻等《赵翼及其〈陔余丛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王树民《〈陔余丛考〉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姚继荣《清代历史笔记论丛》(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翁长松《清代版本叙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版),王松涛《书〈陔余丛考〉“露布”条后》(《古籍研究》,2009年上、下合卷),李寒光《〈陔余丛考〉抄袭说辨证八则》(《历史文献研究》,2019年第1期)等。

其一,通过对《陔余丛考》史书编纂中繁简、体例、编次、正误等方面的研究,展现该书中关于此部分的内容和价值,从而进一步丰富赵翼的史学思想。其二,以二书中关于《新唐书》《旧唐书》的论述为切入点,探究二者的差异性和相同性,通过对比展现二书的学术特点,也为探究赵翼个人史学路径的转变提供个案支撑。有感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为论之。

一、《陔余丛考》的史书编纂内容与价值

在《陔余丛考》中,赵翼对史书的考评着力甚多,究其价值,主要在于史书繁简、体例、编次、校正史书、补充史籍等多个方面。

(一)繁简

史家在修史过程中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哪些材料应该收入其中,哪些可一笔带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家的才能和当时的修史环境。《陔余丛考》注意到了该问题,其论述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对于词章、奏疏等原始材料收录过多而导致史书繁简失当。如卷七“《齐书》繁简失当处”条:“《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盖亦仿《宋书》之例。如《豫章王嶷传》载其辞殊礼一表……《崔祖思传》载其崇节俭、省刑狱、定乐律、开屯田、设史官、招贤才等疏,共二千余字。虽多有关时事,然何妨节存之,乃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何以徒费笔墨若此?……《南史》因此特立《子恪传》以载其事,而《齐书》子恪无传,仅附于《豫章王嶷传》数语。此皆繁简之失当者也。”^{[2]113}该条目认为在《齐书》的编纂中存在繁简失当的问题,繁复之处在于对奏疏之类的原始材料收入过多,不加裁剪,使得史书冗沓。较为简略的地方在于对关键事件的描述较少,赵翼在文中例举典签权责之重、明帝因子恪之言而赦免诸王之事以说明问题。笔者以为这类繁简的失误在于不够爱惜笔墨,将材料一概收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修史者对历史材料的利用不当,裁剪的功夫不深所致。同类的条目还有卷六“《宋书》繁简失当处”条:“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原有载其全文者,如贾谊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关政治即有关道学。至司马相如《大人赋》之类,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故存一二以见一斑,其他则不概录也。《宋书》则凡有文字无不收入。”^{[2]108}该条目的问题与前者相似,皆为对材料不加筛选、裁剪,一概收入,使得史书过于繁复,以此可见此史书的优劣之处,更应在修史中引以为戒。

其二,内容设置上有不当之处,因而导致繁简各异。如卷七“《魏书》芜冗处”条因为立传者附录子孙,故导致过于繁杂,“《魏书》最为芜冗。尤可厌者一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绩无功绩,皆附缀于后,有至数十人者”^{[2]124}。在史书编纂时,收入较多的新奇荒诞之事使得史书繁费,如“《南、北史》亦有繁冗处”条:“《南、北史》本李延寿承其父大师遗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迹,勒成此书。《新唐书》谓其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远甚。今按其书,较各朝史实为简净,然亦有采摭新奇荒诞之事增多于旧者。”^{[2]148}赵翼认为《新唐书》中关于《南史》《北史》的评论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过多记载新奇荒诞之事的情况。“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条:“《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凡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然《旧书》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而《新书》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2]160-161}对《新唐书》《旧唐书》两本史书的繁简之处进行对比,指明其特点,这样将有助于对二书的阅读和利用。以上多种情况都反映了因内容设置上的不当而导致的繁简各异。

其三,史书源流优劣不一,故繁简各有得失。在此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史书中所记载的史事可能不实时,后修之史书对于前代史书于重合部分多有删减。如“《北史》删《魏书》太简处”条云:“《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删成,然《南史》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北史》于原魏纪传则但有删减

耳。”究其原因,赵翼发现“又其于南北交兵之事尤为简略”。故大胆猜测:“岂《魏书》所载本不实耶,抑南北两朝国史各自夸胜讳败,若一一存之,则《南、北史》核对多不符合,故宁一切删之,以免歧互之迹耶?”^{[2]137-139}该条对《南史》《北史》中删简过多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是由于二书在源流上多因袭《魏书》,而《南史》《北史》编修者与《魏书》的编修者立场不同,故而删减过多。

史书内容的繁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书的水准,也反映了修史者的用心程度和才能。在史书繁简的论述中,《陔余丛考》针对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原始资料引用不加删减、内容轻重安排失衡以及延续前代史书的选择等进行标明,后世学者在史书编纂中应对此类问题加以吸收,给史学工作以警戒和启发。

(二)体例

刘知几在《史通》中曾言:“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体例对于史书编纂之要可见一斑,《陔余丛考》在评论历代诸史时亦关注此问题。

其一为考察体例之源流。如“《史记》一”条:“班彪谓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是盖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史迁创例。然《文心雕龙》云:‘迁取式《吕览》,著本纪以述皇王。’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矣。……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然则本纪、世家非迁所创,而列传则创自迁耳。”^{[2]75-76}该条目提出了几个较为重要的观点,考证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来源于汉代以前的《禹本纪》,并非《吕览》一书。关于世家的来源,赵翼同样认为非司马迁所创,但并未考其源头。赵翼肯定了列传乃是司马迁首创,对司马迁之前的《尚书大传》《尚书传》中“传”的含义进行分析,认为其与司马迁所“专以叙一人之事”的“传”大不相同,故而认为司马迁乃首创。对于体例的论述还包括论述《通鉴纲目》编年体的源流,认为“《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并举“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2]233}等例子以论证。

其二为史书编纂中体例得当与否的点评。如“《汉书》”条:“《史记》通记古今人物,与专记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盖已编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为纪,冠于本朝帝王之上,究属非礼。陈涉王数月而败,身死无子,亦难列为世家。……盖著作之事创者难,而踵而为之者必更精审也。”^{[2]88}该条目笔记《汉书》与《史记》中关于本纪、世家、列传的设置安排,其实背后透露的是赵翼对史书正统观念的关注,称赞《汉书》在此方面的精到。认为《后汉书》在卷末设置“赞”乃是繁复之举,是对《史记》《汉书》之“论断”“赞”理解不实的产物。

此类例证还有称赞《明史》中多附书,赵翼云:“《明史》事多而文省,最为简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书之例。如《忠义》《文苑》等传,一传之内,牵连书者骤数十人。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故各从其类一一附书,既不没其人,又不伤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2]226}认为《明史》用附书这种方法既避免了遗漏人物,又使史书简洁明了,大为称赞此做法。《陔余丛考》中这些涉及表、志等体例的问题较为充分地展示了赵翼在史书编纂中关于体例的见解,展现了其史家的才能。

(三)编次

史书编次在《陔余丛考》中也多有论述。

其一为对于在史书中出现位序的重视,此项反映了赵翼对于史书正礼仪功用的关注。如“《齐书》编次失当处”条认为:“《齐书》卫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岂可乱其序乎?”^{[2]112}“《梁书》编次失当”条认为:“《梁书》编次亦有失检

处。武帝《郗皇后传》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贵嫔、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简文庶母也,岂得反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何必先媳而后姑耶?”^{[2]116}

其二为所立传之人归于何类的问题。如“《陈书》编次得宜”条:“然《南史》以衡阳、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内,则非也。衡阳乃武帝子,应继大位,以陷于魏未归,故不得立。及归而文帝已立,遂为所害。此岂得仅入宗室内乎?”^{[2]119}“《周书》”条:“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2]128}“《南史》编次失当处”条:“始安王遥光之反也,刘讽、柳叔夜虽甘为之死,终属助逆,乃列之《孝义传》。董僧慧以晋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奋身殉难,而《孝义传》反无之。”^{[2]153}赵翼关注到传主收列不当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具有正礼仪、示惩戒的史学思想。

(四)书法

对于史书在表达某种态度和给后人传递信息时,常常会有不恰当的情况。《陔余丛考》中有较多的条目涉及“书法”的论述,其内涵为在修编史书时应该遵循的方法。

其一为史书修编中名位的安排。如“《史记》二”条云:“《史记·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得沛后称沛公,王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后代诸史皆因之。”^{[2]76}赵翼对刘邦在史书中称呼的变化十分认可,符合其对礼仪的重视。“《史记》三”条云:“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2]76}赵翼认为,在《史记》中将孔子列为世家的原因是对孔子的尊崇,并在其他的世家中也提及孔子的活动,可见对孔子的重视。以上条目通过对史书中书法得失、优劣进行评价,反映了赵翼的史学观念。

其二为明确传中所载所记都应该为叙事而设置。卷五“《史记》四”条:“《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2]77}赵翼对比评价班固与司马迁对于蒯通之语的处理,认为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传》中记载蒯通之语是为了说明韩信的心境和立场,而班固却将蒯通另立为传,与《韩信传》中略讲蒯通之语相比,反而使得史书繁冗。由此可观,赵翼认为在传中应该围绕突出人物和讲述故事的主题来安排材料。

其三为褒扬直笔而批评回护过多的做法。如评论《宋史》中较多的回护的情况。“《宋书》书法”条:“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时尚存,闻义嘉难作,晋安王子勋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秘之,丧如礼。事亦见《南史》,自是当日实事。而《宋书·路淑媛传》即路太后。但叙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无一字,亦不错见于他传。可见《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2]107}并分析其原因:“按沈约尝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撰《宋书》在齐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齐易代之际,自不敢直笔,即单纪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即为根据作者沈约所处的环境来分析其史书中回护的原因。

其四为对史书中文法的关注。对《南史》《北史》中因词汇多次使用而使得文字重叠、句法重复的情况进行评论,认为:“《南、北史》虽善叙事,然句法重复处太多。如《何远传》,远归家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虽卷帙繁多,自不能无重叠,然亦可至累百其词,略无变换?观《史记》《汉书》随笔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计矣。”^{[2]149-151}赵翼认为在《南史》《北史》中关于句法的重复太多,经常使用相同的词汇和语言来描述事物,并举《史记》《汉书》等对比。赵翼关注到《旧唐书》中录入较多市井俗语的情况,并认为《新唐书》中多有纠正。

(五)校正史书

历代史志,尤其是正史,多为后人撰写,记载讹误在所难免^{[4]199}。史事在史传中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其一为记载出现事实失误,即前后说法不一。卷五“《汉书》”条:“然固亦有疏漏者。《项籍传》:田荣怨楚,乃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荣所予也。而《彭越传》则曰: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则又以为汉予之印矣。”^{[2]88}该条目发现两传中对于赐印之事的记载是冲突的。赵翼在《陔余丛考》对史书编纂的考察中十分关注史事记载的真实性,由以上诸多例证观之,可见其“求真”的史家态度,也可为后人阅读和利用相关史书提供借鉴。

其二为事实的情理不符合逻辑。如“《南史》叙事失检处”条:“《南史》叙事亦多失检处。如《江祏传》,既云‘明帝辅政,祏每说以君臣大义’,是祏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祏劝出以示人’,是祏又助逆之首也。”^{[2]151}对于同一人的政治态度记载出入过大,赵翼分析其原因为:“盖延寿好奇,凡又所闻事迹,皆欲胪列传中,遂不觉拉杂如此也。”^{[2]151}“《北史》叙事失检处”条:“《赵郡王元湛传》,既谓湛与尔朱荣争庄帝迁洛事,荣怒曰:‘何关君事?且河阴诛杀大臣,君亦应在其内。’湛曰:‘天下事天下论之,何至以河阴之役来恐人?元湛宗室近属,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是湛亦能执志抗暴者。乃传末何以又云‘湛无才识,时人忽之’耶?”^{[2]152}可见赵翼不光对明显的史事记载冲突给予关注,在阅读史书时也常思考其内在逻辑,从而判断史书正误。

其三为同时段史书记载史事互相冲突。如“《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条:“《北史》,梁武帝破建业,执萧宝夤,将杀之,宝夤逃奔于魏,历显仕,屡与梁战。后以谋反诛。是宝夤仕魏三十多年而死也。《南齐书·宝夤传》则谓齐和帝中兴二年,以谋反诛。是宝夤当梁武未为帝时已被刑矣。”^{[2]134}并分析其原因:“盖萧子显撰次《南齐书》在梁时,有所忌讳也。”两本史书中出现了同一个人不同时间死亡的错讹,赵翼认为此现象与修史者所处的环境有关,使其无法直书。“《南、北史》自相抵牾处”条:“《南史·张丽华传》,丽华从陈后主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于青溪。而《北史·高炯传》:晋王欲纳丽华,炯曰:‘武王伐纣妲己,今平陈,不宜娶此。’乃斩之。是《南史》以为晋王所杀,《北史》以为高炯所杀,其自相抵牾一也。”^{[2]147}该条目达数十条之多,对《旧唐书》《新唐书》之间的对比讹误提供了帮助。该部分为赵翼对同时段史书比较的一个部分,主要为标明其间记载的冲突。

其四为同时段对战事胜败的记载不同者。如“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载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2]201-203}分析此类的原因:“历观数事,宋之胜也,辽不言败,辽之胜也,宋亦不言败,彼此各夸其功而讳其辱。盖国史本如此。”“大抵交战则讳言败,请和则讳言先,两朝修国史时,固已各自争雄如此耳。”对不同政权关于同一战事的记载,难免会出现彼此立场的不同。

以上观之,关于赵翼对于史书错讹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一部史书中事件记载有误和逻辑不通畅、同一时段史书中记载事件的不同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在于史家的才能和细心因素所致,而后者则涉及修史者的立场、环境等原因。《陔余丛考》对此考察的意义在于:其一为部分纠正了史书记载的错误,以便利用和阅读;其二为在表现同时段的史书错讹中,部分地展现了当时修史的状况以及史家在修史时面临的处境、选择等。

(六)补充史籍

史书中缺文和衍文的标明。此类情况有“《史记》缺文 《汉书》衍文”条:“《史记·赵世家》,

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邯郸,赵都也,都既失,则君托迹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书其奔郢奔随,齐泯王之失临淄也,书其奔卫奔鲁奔莒。今两年之内不书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汉书》: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谓是景帝母窦太后耶?则崩于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时也。谓是景帝废后薄氏耶?则不当云太后,且废后死不书也。则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马相如传》:‘其为祸也不亦难矣。’‘亦’字亦衍文。《刘向传》:‘上欲用向,骤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上‘不’字亦衍文也。”^{[2]92}赵翼通过对史事逻辑的推理入手,分析在《史书》《汉书》中缺文和衍文的情况,可谓是对其读书所作的修正札记。

史书注解中的理解有误。“颜师古注《汉书》”条:“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祥,然亦有纰缪者。《韩信传》: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师古曰:直带一剑,更无余资。此特因上文历叙信贫况,遂从而为之说耳。按许氏《说文》:杖,持也。然则《信传》之仗剑,与《张耳传》之杖马垂,《苏武传》之杖节牧羊,不过同一执持之义也。”^{[2]93}

赵翼对于史书中注解的纠正也是其读史札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为其在日常读书中的随手所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陔余丛考》的著作特点,这与《廿二史札记》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下文中笔者将详细展开。

二、《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史书编纂对比

在《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中都存在着对史书编纂的考察,但是两者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主要体现在其具有相同的史学思想,即为对补史的意识、“求真”的史学观和对文风的重视。补史的意识体现在赵翼在考察史书时常广征博引,利用同时段的文献资料来补充和纠正史书中的不足和错误,赵翼有意识的补史行为在《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二书中都有体现,属于赵翼史学思想中较为突出的特征。“求真”的史学观和对文风的重视则涉及赵翼对史书优劣的判断标准。赵翼在评价某一史书优劣与否时,常常会专注于史书的记载是否属实这一范畴,例如出现同一书中前后矛盾的现象,赵翼便将其标出,其中也反映了赵翼善用考证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此种方法避免了用他人记载的材料考证而产生的复杂状况,将问题简单化,但弊端在于此种考证的范围太小,毕竟此类错误仅属于史书错误的一部分,不能全面地考证史书。文风的优劣同样是赵翼考察史书的重要标准之一,简练与冗杂、孤僻与通俗都属赵翼对文风的考察范畴,这还仅仅是技法的层面,更为深层次的是赵翼对市井俗语在史书中出现的批判,反映了其对正史的期待与定位——应是典雅的文章风格。

不同点在于二书在技法上的差别,具体体现在《廿二史札记》在论述水准、文字处理和论述重心上较《陔余丛考》略高一筹。在论述水准上,《廿二史札记》对史书的评价更加凸显其善于归纳总结和挖掘事物的深度。在文字处理上,《廿二史札记》更加凝练和典雅,较之《陔余丛考》,感观差异较大。在论述重心上,《廿二史札记》更加突出重心,走出了《陔余丛考》较为散乱的状态。

为较为集中地展现问题,笔者选择两书中对《新唐书》《旧唐书》的考察作为主要材料展开论述。

(一)相同点

1. 对文风的重视

《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在史书编纂考证中都表现出对文风的重视。如《陔余丛考》卷十一“《新唐书》文笔”条^{[2]174-177}就体现此点,首先,赵翼认为“《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而“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至有市井俗语亦一概阑入,绝不检点

者”。并举《史思明传》中的例子说明：“《史思明传》，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后与《新唐书》对比，认为宋祁“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可见赵翼对文笔、文风的关注。

在《札记》中也有相类似的考察，如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条：“欧、宋二公，皆尚韩、柳古文，故景文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赵翼分析其原因为：“此皆文人气类相惜，有不期然而然者。”^{[5]404} 在该条目中关注到《新唐书》对韩愈、柳宗元文章的偏好。赵翼不光在《新唐书》《旧唐书》的考察中有重视文风的倾向，在其他史书、史实的考证中也多有此现象，如《札记》卷二十九“元人译诏旨雅俗不同”条、卷二“汉诏多懼词”条等。

2. 补史的意识

史实记载的阙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因为任何史志也无法穷尽繁杂而多彩的历史画卷^{[4]211}。《丛考》《札记》都具有补史的意识，纠正史书中的错讹、比较相同时段史书的不同。《丛考》卷十二“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条^{[2]191-198} 对《新唐书》《旧唐书》中的不同之处，利用其他史籍进行辨正，如“酅国公薨，《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新书》在八月。按《纲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酅国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与《新书》同。”列举了数十个不同之处，可为阅读《新唐书》《旧唐书》时作参考。同卷“《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唐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其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条、“《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条都可作为两书阅读对照时使用。《札记》中也有此类条目，如卷十七“《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条、“《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新书》删《旧书》处”条等，这种对两书比较的条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赵翼对史书的补充意识，并可作为阅读此书时的工具和备用书籍。

3. “求真”的史学观

赵翼对于史书优劣的评价标准较为突出的特点为“求真”。赵翼谈及“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2]160}？对于在镇州军乱之事上，赵翼认为《新唐书》所载王廷凑杀节度使一事所载不实，会引起歧义。不仅在《新唐书》《旧唐书》的考察中有此观念，而且在其他史书的考论中也皆可见此，如《丛考》卷九“《南史》叙事失检处”条云：“《南史》叙事亦多失检处。如《江祐传》，既云‘明帝辅政，祐每说以君臣大义’，是祐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祐劝出以示人’，是祐又助逆之首也。”^{[2]151} 在同一传中对江祐的描述前后不一致。

(二) 不同点

1. 《廿二史札记》较《陔余丛考》的论述水准更高

首先体现在《札记》已经上升至归纳总结的层次。如同为比较《新唐书》与《旧唐书》，《丛考》中的条目有卷十“《新唐书》改订之善”条、卷十二“《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唐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其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条、卷十二“《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条等，这些条目多直接对比，并无总结之处。《廿二史札记》中对《新唐书》《旧唐书》的对比已经出现了总结归纳的现象，卷十七“《新书》增《旧书》处”条云：“试

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5]381}对《新唐书》增加的部分进行分析和归纳。

《廿二史札记》谈及《新唐书》《旧唐书》对《白居易传》记载的不同,其云:“《白居易传》,《旧书》载其与元稹书,极叙作诗之功,及得名之处。后移忠州,与稹相遇于夷陵,流连文酒,写《木莲荔枝图》以寄朝士。晚归东都,作《池上》篇,寄与樊素、小蛮,及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等事。《新书》则一切删之,专叙其疏谏吐突承璀不可将兵,献《虞人箴》以儆穆宗好猎,并措置河朔,请令李光颜将兵,裴度镇太原等疏,与《旧书》命意迥别。”对《新唐书》《旧唐书》对白居易记载不同的现象,赵翼认为是由于“盖《旧书》专表其诗才之高,襟怀之旷,置之恬淡一流,而《新书》则欲著其立朝丰采议论,以见文人中自有名臣,此又景文深意也”^{[5]404}。赵翼认为《旧唐书》对白居易的描写重心在于其诗才,《新唐书》中突出白居易的务事能力,并将对白居易记载不同与作史者想要表现历史的角度不同联系起来,见识不凡。

2. 《廿二史札记》较《陔余丛考》的文字更加精炼、简洁

《廿二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条与《陔余丛考》卷十二“《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唐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其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条有重合之处,现就举其中一例对比观之。

《陔余丛考》中“《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唐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其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条:“《宋璟传》,《新书》增郝灵佺出使,斩默啜首以献。璟恐天子喜边功,抑之不擢。此见璟之识大体。《旧书》不载,《新书》补之,良有意也。又增后来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璟危言切论,未尝不失声太息。此尤见璟之生平。”^{[2]187}《廿二史札记》中“《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条:“《宋璟传》。增璟不赏郝灵佺斩默啜之功,恐启天子倖边功。此见大臣远虑。又增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璟危言切论,不觉失声叹息。”^{[5]383}这个两部分所论为同一件事,《廿二史札记》较之《陔余丛考》则凝练、简洁,给人以典雅、庄重之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赵翼凝练字句能力的提升。

3. 《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的考论重点和内容不同

此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赵翼选题的差别。《廿二史札记》的重点更为突出,以《新唐书》《旧唐书》相关的对比来看,《陔余丛考》涉及的面比较广,既有对《新唐书》《旧唐书》单个的研究,如“《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条、“《旧唐书》编订之失”条、“《新唐书》编订之失”条、“《新唐书》得史裁之正”条等条目,也有关于《新唐书》《旧唐书》对比的条目,如“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条、“《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唐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其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条等条目。从总体上讲,《陔余丛考》涉及《新唐书》《旧唐书》在书法、回护、文笔、讹误以及两书对比的不同。

从整体上来说,《廿二史札记》篇幅更少一些,重心更加突出,《廿二史札记》关于《新唐书》《旧唐书》的史籍考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新唐书》《旧唐书》作者、史源的考察,集中在“《旧唐书》源委”条、“《新唐书》”条、“《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条、“《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等。第二,对《新唐书》《旧唐书》文风的考察,如“《新书》好用韩柳文”条、“《新书》详载章疏”条、“《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条等。第三,《新唐书》《旧唐书》的对比,主要为“《新书》增《旧书》处”条、“《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条、“《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等。从这个方面讲,《札记》对《新唐书》《旧唐书》作者、史源、文风的考察部分在《丛考》中几乎是没有的,可以补充赵翼的

史书编纂内容和方法,收互补之效。

从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两书关于史书编纂的对比中,可发现在赵翼史学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研究者与所研究对象的共情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使用碑刻文献的过程中需要田野调查,这种调查会使研究者“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和古人情感的学术思想”^[6]。同样,在我们研究赵翼史学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同情的问题。其二,重视时间序列的问题。由于《廿二史札记》的名气较大,使得在研究赵翼史学时,常常忽视了《廿二史札记》作为其后期作品的问题。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链条,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考察赵翼个人学术史的变化,从而为清中期学术史变化提供个案参考。在清代学者普遍具有撰写笔记类学术著作的环境下,类似的考察将大大丰富和完善个人学术史的构建,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学术道路上探索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杜维运. 赵翼传[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122.
- [2] 赵翼. 陔余丛考[M]//曹光甫,点校. 赵翼全集(第2册).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3] 刘知几. 史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4.
- [4] 孟凡港. 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9:199.
- [5] 王树民. 廿二史札记校正[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6] 孟凡港.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362. Twenty—two Historical Books

The Thought o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in Zhao Yi's *Gai Yu Cong Kao*

YAN Zhi-qiang, JIANG Xiu-x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 Zhao Yi (1727–1814) was a famous official and scholar of Qing Dynasty, whose thought o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wa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His idea was recorded in his book *Gai Yu Cong Kao*, which discussed the degree of detail, style, arrangement,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 of historical book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book and *Twenty-two Historical Books*, another book of 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se two books are similar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emphasis on style, suppl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ursuit of truth. They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ir academic levels, the content and focus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Zhao Yi's thought on historical book compil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academic ideas.

Key words: *Gai Yu Cong Kao*; *Twenty-two Historical Books*; historical book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朱 根〕